
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的关联性分析

——兼论第 23 届参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局

吕耀东

内容提要：日本政党政治的历史与现实，证实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相向而行且表现出直接的相关性。日本传统革新政党及其他在野党日渐式微，不足以形成遏制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有生力量。传统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在第 46 届国会众议院和第 23 届参议院选举中两连胜，一举打破“扭曲国会”困局，标志着日本政坛回归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宣告“两党制”构想及实践告一段落，导致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再次提速，政治右倾化加剧。

关键词：参院选举 一党独大 总体保守化 政治右倾化 政党政治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3) 05-0003-23

日本传统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在第 46 届国会众议院和第 23 届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双赢，实现了日本“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回归。日本政党政治重现“总体保守化”^①景象，随即政治右倾化日渐凸显。那么，日后政治右倾化是否会再度侵蚀或渗透日本的内政外交呢？对此，本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的关联性进行探析。

一 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性

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受到国际环境变动和日本政

^① 关于“总体保守化”概念及定义的详细解释，参见《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日本学刊》2004 年第 4 期）一文中的相关论述。

治变革的深刻影响，在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动中体现为传统在野党与保守的执政党在纵向上的此消彼长和横向上的同向变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张扬，并促进日本政治右倾化，体现为日本政党政治从量变到质变走向总体保守化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总体保守化是日本政党政治格局严重失衡的结果

“1955 年体制”确立后，日本保守政党一直作为执政党而存在，而革新政党则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只能进行监督政府、牵制执政党的活动，被称为“万年在野党”。^①但是，这样的政党政治格局随着冷战结束而严重失衡，并随着日本保守与革新政党的强弱显现而转向总体保守化。

1. 总体保守化是日本保守政党自身变革的结果

1993 年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野，同时宣告“1955 年体制”终结。自 1955 年自由、民主两大保守政党合并以后，执政 38 年之久的自民党失去了执政地位。^②从表面上看，是因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斗引发自民党的分裂，是自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但从深层次上分析，“自民党的分裂是自民党为争取成功而采取的以退为进的步骤”。因为，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并组成联合政权的细川内阁的政治改革方案，在内容上与自民党的政治改革方案相差无几。另外，多党联合政权不是各党的政策之争，而是政治家的利益之争，这也同样是自民党政治的特色。也就是说，“日本政治仅仅是将过去自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力抗争置换成各政党间的权力抗争”^③。所谓自民党一分为四产生出来的党派，实际上是自民党内部派阀体系之间的权力斗争演化为“1955 年体制”后的保守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新党派同自民党一样秉承着保守主义的执政理念，执行着与自民党一样的政策。自民党与这些分裂出来的新党派，只有新旧之分，而无实质差别，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传统保守势力和新保守势力。尽管两者在个别具体政策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均是秉承保守主义的政党，两者之间的对立也仅仅是统一体中的对立而已。新保守势力和传统保守势力在构建“保守两党制”的政治实践中，实现了从分到合的实力提升，确立了整

① 山口二郎『危機の日本政治』、岩波書店、1999 年、29 頁。

②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 年、38 頁。

③ 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6-7 页。

个保守势力在日本政党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日本政党中的保守势力正是通过裂变再走向合流，实现了整体实力的扩张，最终实现总体保守化在日本政党政治中的形成和发展。

从“1955年体制”的解体过程来看，在冷战结束、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先行解体的不是日本的革新政党，而是在日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自民党，但这仅仅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个表面现象。自民党所谓的分裂，实际上是由自民党内部的“改革派”主动出击进行的一场自民党内部的“自我革命”，是日本新保守势力对于传统保守势力的“革新”，是一场“扬弃”性质的变革，实现了保守势力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壮大。自民党的分裂，形成了新保守势力和传统保守势力两大部分，对于整个保守势力来说，是一次良性的分裂，实现了两大势力的各自发展和扩大。新保守势力通过各个保守政党在联合中的系统组合，实现了在政党政治格局中实力的提升。其中，从自民党中脱离出来、另立新党且出任要职的有细川护熙、羽田孜、小泽一郎和鸠山由纪夫等人。^①1996年传统保守势力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最终实现了重新执政的“保守回归”。随后，新保守势力与传统保守势力又实现了在多党联合政权中的“聚合”，实现了保守势力的整体壮大。1999年10月，自民党小渊内阁与自由党、公明党达成协议，建立三党联合政权。尽管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在2000年4月退出三党联合政权，但后来成立的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仍然维持了自民党、公明党以及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新成立的保守党之间的三党联合，这在加强自民党执政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保守政治的局面。^②

2. 总体保守化是日本革新政党衰落的过程

在日本保守势力走向强势的过程中，革新势力却日渐衰落。“1955年体制”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日本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的对峙格局，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实力对比的不平衡。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

^① 参见后藤田正晴：《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王振宇、王大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② 参见李阁楠：《由日本民主党崛起引发的思考》，《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3期，第43页。

力的对峙局面，成为冷战时期日本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但是，因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以社会党、共产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在日本政党格局中的实力大为削弱，冷战时期保守对峙的斗争焦点逐渐弱化，保守与革新对峙的“1955 年体制”也失去了时代的依托。作为日本革新势力主体的社会党，在苏东剧变和国内选举制度改革的双重压力下，实现了政策的根本转变。在 1994 年 9 月举行的社会党第 16 届临时全国大会上，通过了《我党面临当前政局的基本态度》，表示承认自卫队的存在没有超越宪法，坚持《日美安全条约》，要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承认“太阳旗”是国旗、“君之代”是国歌。社会党在与自民党进行联合执政的过程中，认同并执行了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策，逐步走上了“自民党化”的道路，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走向总体保守化。^①

日本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并保持“共产党”称号的同时，也采取“灵活性”的态度，不断进行政策调整。2000 年，日本共产党的二十二大对党的纲领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先锋队”以及“日本人民”的用语，党的性质也被表述为“既是工人阶级政党，同时也是大众性政党”。^② 2004 年 1 月，日本共产党二十三大提出并修改了党纲，指出，目前日本所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尽可能推进的民主改革”。该党的政策调整表明，革新政党正在艰难的道路上寻求和拓展新的空间。但是，总体来讲，革新力量在日本政党格局中，已逐渐失去了原有对保守势力的制衡力和牵制力。革新政党衰落的过程，也就是日本保守政党不断壮大的过程。尽管如此，日本共产党仍然是捍卫革新阵营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日本经济进入“平成萧条”后，社会出现新的“贫困化”现象，日本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批评保守政府的责任，积极展开声援提高年轻人就业率等活动。但是，在保守主义政党日益强大的形势下，坚守革新“阵地”的日本共产党势单力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总体保守化的进程。

① 川端康夫「政治の総保守化のはじまり—政界再編の第三幕への突入—」、『労働者の力』第 58 号、1994 年 7 月 10 日、<http://www.interq.or.jp/leo/sinter/old/pow58.htm>。

② 参见加藤哲郎：《日本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北京大学“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 年 1 月，第 6 页。

3. 总体保守化也包括公明党从“中道”走向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道路

总体保守化是日本各个政党在政党格局中力量强弱对比上的具体表现。尽管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在日本的影响远逊于欧洲同类型的政党，但奉行“中道主义”的公明党，在日本政党格局中，却处于革新与保守对峙之外的“第三极”，并且起着平衡保革对峙的“砝码”作用。虽然公明党具有宗教色彩，拓展政治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与社会党、共产党等意识形态较强的政党相比，公明党更具有政策“灵活性”的特点。从1993年加入多党联合政权到并入新进党，从再次重建到加盟自民党的联合政权，公明党自冷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执政地位，放弃“中道主义”立场，政治“砝码”逐渐“右倾”，对日本总体保守化的进程起到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

(二) 国际环境变化是日本总体保守化形成的外在影响力

二战后，社会主义在东欧及中国等亚洲国家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人民的革命热情，反对战争带来的饥饿、贫困及美军的占领等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占领当局为了将日本建成反共阵营在东方战线的坚固堡垒，竭力扶植包括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在内的保守势力，并促成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合并，形成日本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并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势力相抗衡，确立了保革对峙的“1955年体制”。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里，日本国内革新与保守的对峙格局注定是一种力量不对称的关系，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范畴的日本革新势力，注定要受到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保守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在1960年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支持民众“反安保斗争”失败后，保革之间力量的不对称状态进一步加强。冷战格局的形成，是日本保守势力胜于革新势力的主导原因。苏东剧变之后，日本的革新势力不仅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失去了存在的国际背景。相反，日本的保守政党却因冷战的结束而进一步强大，并积极寻求在政治上削弱和消除革新政党。“1955年体制”的崩溃，是革新政党衰落和保守政党不断壮大的开始。另外，受苏东剧变和“1955年体制”崩溃的冲击，革新政党完全失去了与保守政党抗衡的能力和思想意识。日本社会党受国际社会党的影响，通过

与自民党联合执政，逐步走向保守化。日本共产党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了政策的适度调整。

冷战后，“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和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强化美日安保同盟并带有亲美色彩的强大保守政权，使其担当起自己在亚洲的伙伴和助手责任”。日本保守政党正是借助美国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并且“把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的根本立足点，因此，能否在国会取得稳定多数成了执政党维持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需要”。“所以，新老保守政党组成联合政权，从而确保日美军事、安全合作顺利进行，自然也是美国愿意看到的结果。”^①以海湾战争为契机，日本保守势力因日美同盟的强化而得到了扩大。2001 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全面加强，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美国对日本的重视程度提高，并破例把日本列入反恐支援国名单，美国和日本开始了全面的政治和军事合作。美国要求日本派兵伊拉克，客观上为日本保守政府海外派兵提供了借口，间接地促进了日本总体保守化的进程。可以说，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日本的总体保守化成为必然趋势。

（三）选举制度改革从制度上确定总体保守化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中“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实行，不仅加速了日本各政党的分化组合，而且从制度上确定了日本的总体保守化。选区是选举的区域单位，是选民进行选举活动和产生候选人的基本单位。“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政党，为了自己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地位，经常在选区划分上玩弄花样”，“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区，它们采取少设选区或分割选区并入其他选区的办法，使无产阶级的候选人不易当选，使所划选区，让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当选”。^②由日本保守势力促成并经国会通过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从表面上看是为了遏制“金权政治”，实际上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清除革新政党的具体步骤。小选区制的设立，使得长期在野、实力较小的革新政党进一步走向解体。“小选举区制是指一个选区只选一名议员的

^① 蒋立峰、高洪：《日本政府与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132 页。

^② 王松等主编：《政治学常见名词浅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09 页。

选举制度。这就意味着小党单独推荐的候选人难以取胜，政策趋同的政党联合推荐的候选人有望当选。”^① 社会党、公明党正是为了能够与实力强大的自民党候选人抗衡，逐步走上与新保守政党联合和政策趋同的道路。选举制度改革后，尽管在实行小选区制的同时并列有比例代表制，但仅仅是一种对在野小党的兼顾，并不能改变小选区制在选举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改变日本总体保守化的趋向。

新选举制度的实行，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各保守政党的整合力度。过去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保守政党，经过不断整合，又回归到自民党的联合政权中，比如自由党和自民党的执政联合、保守党与自民党的联合执政等等。另外，保守政党和倾向保守的“中道”党，实行议会联盟和联合执政。日本保守政党经过裂变—扩张—整合的三个阶段，实现了日本的总体保守化。社民党削弱，民社党消失，公明党“执政化”，这是新选举制实行后的必然结果，使得“1955年体制”下的政党制衡格局彻底改变，原传统在野党在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或消失或日趋保守化，最终导致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局面。

二 总体保守化氛围中的政治右倾化

随着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发展，日本政坛的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此消彼长，中道主义势力逐渐与保守势力合流，左右倾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日本政治向右转成为必然。因为长期以来奉行保守主义的自民党在国会内拥有多数席位，通过控制国会，进而使国会成为保护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在野党，虽然在国会中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但因力量分散而只能起到部分制约作用。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在野党势力，通过与保守政府的斗争，曾有效地阻止了政治右倾化的发展进程。^② 然而，“1955年体制”崩溃后，1994年实

^① 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② 冷战时期，日本保革对峙的斗争焦点有：（1）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2）修改宪法还是维护宪法，（3）坚持日美同盟还是和平中立，（4）加强军备还是“非武装中立”等。参见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第138页。

行的新选举法限制了社会党、共产党和其他在野小党候选人的当选，进而限制其在议会中的议席数量，最终将国会中的革新政党限制到最低限度，从而有利于通过包含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有关法案。在日本总体保守化的环境下，反对通过有关修改宪法的议案、节制扩充军备和反对海外派兵等呼声日渐式微，政治右倾化不断加深。可以认为，政治右倾化是在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发展进程中，保守政党将其保守主义执政理念转变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的行为或过程，同时也是保守政党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政策层面上的具体表现。

（一）政治右倾化诉求：通过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相关法案

冷战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积极倡导所谓“国际贡献”。为了给自卫队海外派兵提供法律依据，海部俊树内阁向国会提交了“触碰宪法根本”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PKO 合作法案）。^① 1992 年 6 月，该法案在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反对声中由国会审议通过。该法案的通过，使自卫队迈出了“合法”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并打开了解释性修改和平宪法的大门。随后，一系列包含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法案相继获得通过。

1999 年 8 月 9 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颇有争议的国旗、国歌法案。这是在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以及民主党部分议员的赞同下通过的。但是，在国会中反对这一法案通过的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认为，强制国民特别是教育界挂国旗、唱国歌侵害了宪法关于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主权在民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忘记“日之丸”、“君之代”曾是日本对亚太近邻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象征。所以，“日之丸”、“君之代”作为当代日本的国旗、国歌是不适当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志位和夫曾质问首相小渊惠三说，以保守政党执政优势通过国旗、国歌法案，是封杀保障国民民主讨论的强制行为。^② 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国旗国歌法》规定，日本的国旗为日章旗，国歌为“君之代”歌。^③ 日章旗即“日之丸”旗，俗称太阳旗。旗正中的红圆形代表太阳。“君之代”又被译为

① 内田雅敏『戦後の思考』、れんが書房新社、1994 年、151 頁。

② 「『日の丸・君が代』法案について」、http://www.shii.gr.jp/pol/1999/1999_06/1999_0629.html。

③ 『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法律』、<http://bunka.hourei.info/bunka27.html>。

“君主御世”，即赞颂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君主。其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战前的天皇制度，一些有历史责任感的日本人至今将“日之丸”与“君之代”视为军国主义象征而加以排斥。

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日本政府趁机制定法案支援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借反恐协同美国走向海外，加快实现“正常国家”的步伐。2001年10月，小泉内阁通过《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随后提交国会通过。该法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自卫队对美支援的区域在“周边地区”的限制，可以应美国要求随时出兵，开战时派遣自卫队的先例。该法还规定，自卫队除对美军进行后勤支援外，将对难民进行救济。该法甚至放宽自卫队武器使用标准，允许在有关国家“同意”和在“非战斗地区”的前提下，自卫队可在外国领土上开展活动，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全战略的重大突破。

2002年4月，小泉内阁通过了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在内的所谓“有事立法”三大相关法案。随后，参议院以近九成的赞成票通过了“有事立法”相关三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或者“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民如何应对，其中包括设置以首相为首的应对总部；经国会同意后，首相可以通过相应的权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指挥动员，向自卫队、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下达进入战争状态的命令；地方政府和国民届时必须与中央政府合作等。还规定，首相判断“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或者“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有事立法”突出强调了对首相权限的强化，表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

“有事立法”在日本国会的通过，反映出日本的政治生态已发生重大变化，表明在日本总体保守化氛围中政治右倾化的扩大。小泉纯一郎在“有事立法”通过后称，作为政府最重要责任的对付紧急事态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这真是日本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这表明，日本保守政党已经取得掌控国会的主导权。执政的自民党正是通过掌控国会，把保守主义纲领和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的法规及政策。特别是在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以来，日本保守势力利用国会通过《国旗国歌法》、《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有事立法”等具有明显国家主义

倾向的法案。这充分表明总体保守化氛围下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向。

(二) 修改和平宪法动向是政治右倾化的政策体现

现行的《日本国宪法》是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的产物，是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结果，其意义远远超出日本一国之内。日本宪法最核心的是第二章第九条，规定：（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① 因此，《日本国宪法》又被称做“和平宪法”。

自和平宪法颁布以来，围绕着宪法第九条，修宪和护宪斗争从未停止过。但是，随着“1955 年体制”崩溃、革新政党力量的削弱，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就成为保守主义政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可以说，日本各个政党在修宪问题上的言行动向，是判断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发展程度的“晴雨表”。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积极倡导修改和平宪法，表示要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追加“第三款”，允许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指挥下的国际联合机动部队的活动”。^② 1997 年 5 月，日本以宪法制定 50 周年为契机，成立了“推进设置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联盟以自民党、民主党议员为主，积极主张修改宪法。2001 年 1 月，日本众参两院成立了“宪法调查会”，实质上也是“修改宪法调查会”。

执政的自民党向来是修宪的中坚力量。自主制定宪法是“自民党存在的价值之一”，因而“修宪”已经成为自民党的宿命。1999 年 1 月，该党通过的“运动方针”指出，“如果使宪法能够面向 21 世纪，适应时代”，我们要同国民一起推进讨论。2003 年 5 月 29 日，自民党宪法调查会提出了《关于安全保障的修改宪法纲要案》，要“保持国防军”，积极参与国际机构的运营与活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将在自民党成立 50 周年前完成修宪，并且表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为自卫队“正名”，使日本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

^①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kenpo.htm>。

^②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 年、124 頁。

执政的自民党除了要修改敏感的宪法第九条，准许日本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和建立正规海陆空三军外，还力求在所谓国际合作领域内准许日本开展海外军事行动，使日本能够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以日美同盟的形式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小泉首相认为，在修改宪法时，现行宪法所禁止的集体自卫权问题“当然会成为焦点之一”，强调是否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成为修宪的关键所在，“日本应拥有自卫所需的作战能力”。

目前，安倍首相在修宪问题上，显示出比战前出身的政治家更为强硬的政治立场。在安倍看来，“修宪”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这样的“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中韩等国而“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最终成为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正常国家”。安倍本人极力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力求摆脱战败国形象，挑战“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为此，在周边频频挑起事端，恶化邻国关系，破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制造东北亚地缘冲突成为保守派修改和平宪法的最好借口。

日本保守主义政党向来执著于修改和平宪法。正如安倍所说：“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是倡导‘制定自主宪法’，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议案，在国会讨论时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才能通过，这也是当年自由民主两党合作的理由。的确，修改宪法是恢复独立的象征，也是具体手段。”^①这意味着自民党在改变“扭曲国会”困局后，将伙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政党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将变自卫队为正式军队等修宪口号付诸行动。可见，因为“一旦一种有意识地功能化了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成为可能，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不仅意味着一种向某种政治内涵的定位，而且还表明一种特殊的经验和思维方式”^②。无论是冷战前后，日本保守主义政党都始终如一地坚持走修宪道路的理念及思维方式，使得政治右倾化成为历史必然。

①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29頁。

②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三) 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政治右倾化的突出表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歪曲侵略历史、力求修改“和平宪法”、挑战“战后体制”的期望日趋显著。中曾根康弘在《21 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对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问题的看法,反映出日本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观。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又从结果上为战争的非正义性辩解:“大东亚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是不应该进行的战争……然而,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①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在日本政界保守主义者的言行中得到证实。日本首相及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保守政府纵容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歪曲历史事实,正是保守主义历史观在日本政治层面的现实存在。

第一,以首相及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形式否认或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如今靖国神社的所有活动无一不是在颂扬军国主义,宣扬“侵略有理”。1978 年 10 月,靖国神社举行例行“秋祭”时,把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 14 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入神社,作为“昭和殉难者”来加以祭祀。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犯招魂更加密切关联。1985 年 8 月 15 日,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了供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他的做法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谴责。时隔 11 年之后的 1996 年 7 月,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先后六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麻生太郎甚至认为,基于靖国神社供奉的许多亡灵生前是高呼“天皇万岁”而赴死的,因而天皇应该前往参拜。^②可以说,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逐渐向参拜靖国神社“合理化”的方向发展。^③日本首相参拜颂扬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严重违背了日本政府就侵略历史向亚洲各国人民进行反省的承诺,是对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同时也违反了日

① 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 研究所、2000 年、75~76 頁。

②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幻冬舎文庫、2007 年、307 頁。

③ 参见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年,第 318 页。

本宪法第 20 条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有日本学者也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应主要作为政治问题考虑，应该作为包括日本的整个亚洲的问题来进行批评。”^① 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愤慨，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通过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误导日本新生代。日本审定中学教科书的责任机关是文部科学省，主管负责人是文部科学大臣。教科书书稿一经审定合格，文部科学省就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出版社便可拿着样本上市征订和印刷、出版。日本文部科学省屡次给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开具“通行证”，审定该历史教科书“合格”。事实是，该教科书中的不少历史记述严重失实，肆意歪曲历史，将日本有预谋发动的“9·18”事变等歪曲为由中方引起，将“南京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极力否认日军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甚至鼓吹“东京审判”合法性有待定论，鼓吹军国主义侵略有理。日本政府借口教科书是民间学者编撰，极力淡化其内容纲要均须交文部科学省审批的责任，纵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歪曲历史事实，这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第三，安倍等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持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态度。安倍晋三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中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向为我们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尊崇的心情”。他还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因为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所谓“‘甲级战犯’存在着误解”。^② 2013 年 3 月，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战胜国做出的裁决。4 月，安倍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称：“关于侵略的定义，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尚无定论。”安倍“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言论，是对“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严重挑战，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是其错误历史观的延续。这种公然挑衅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侵略定义未定论”，对于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跨党派的，表达了大多数保守派政治家的共同心声，已成为他们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主

① 依田熹家：《日中关系的问题点》，《中日关系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②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69 頁、70 頁。

题。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脱离“战后体制”和追求“正常国家”，是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对待“历史问题”的普遍态度。

总之，否认侵略历史，重新恢复日本因战败受挫的“自信心”，是日本保守势力渴望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心理预热。遵循这样的逻辑，日本政要频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借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否认或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势所必然。

三 日本政坛“一党独大”回归及政治右倾化趋向

国会作为各政党、党派施展政治作用的主要场所，哪个政党控制了国会的多数议席，哪个政党就可以通过立法程序，把本党的纲领和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及相关法律。日本第 23 届参院选举尘埃落定，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大胜，最大在野党民主党惨败，而代表其他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得票锐减，日本政坛重现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自民、公明两党成功打破“扭曲国会”困局，从而为执政党自如地开展国会运营工作扫除障碍。尤其是日本维新会、大家党和民主党大有认同自民党关于修改和平宪法、强化防卫实力等政治右倾化倾向，引起亚洲各国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自民党“一党独大”促进政治右倾化

日本第 23 届参院选举中，自民党在 31 个改选区中，除了岩手和冲绳之外的 29 个选区获得胜利。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共获得 76 个议席，加上非改选的 59 个议席，执政党在参议院有 135 个议席，执政党获得了主导参院审议的稳定多数地位，长达六年的“扭曲国会”现象宣告终结。日本政坛摆脱了朝野政党分控众参两院的困局，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进一步强化了在众参两院的优势地位。

自民党作为 1955 年立党的日本老牌保守政党，有着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也有落选下野的深刻教训。经过几起几落的政治沉浮，在 2012 年底第 46 届众院选举中，在野的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单独赢得众议院 480 个议席中的 294 个席位。为了巩固失而复得的“一党独大”地位，彻底摆脱“扭曲国会”困局，自民党乘胜追击，力求取得第 23 届参院选举的全面胜利。为此，自民党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局面，

安倍致力于灾后重建、经济复苏、改善外交关系,^① 在自民党执政的半年内使得日本经济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

安倍政权最大的胜因, 在于参议院选举时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安倍认识到民主党三年执政乏善可陈的严重后果, 在自民党重夺政权的半年时间里, 成功运作“安倍经济学”, 包括宽松的货币、积极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 促进日本股价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回暖, 唤起了民众对“安倍经济学”后续效应抱有更大期待, 成功促使选民的判断产生倾向于自民党的投票行为。自民党半年多时间连续赢得众参两院选举, 彻底消除了“扭曲国会”这个困扰其保守主义政策出台及落实的障碍。

但是, “安倍经济学”后劲乏力, 不仅未能惠及更多日本民众, 而且其中以2%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伤及韩国、中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安倍经济学”带动日本经济回暖的实际效果也将迎来真正的现实考验。特别是核电政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消费税、社会保障和安全保障等问题成为自民党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正如安倍在参议院胜选后所说的那样: “这一次参议院大选的胜利, 是日本国民对于我们改革路线的支持, 是对半年来积极推进经济发展、重建外交与安保体制的肯定。”安倍声称: “要从今日起, 创造一个崭新的自民党。”^② 安倍所谓的改革和重塑自民党, 就是要在“安倍经济学”奏效之后, 强化该党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即维护所谓自由经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为此, 安倍会重拾选举前的“修宪”和钓鱼岛问题适用日美安保体制等政治右倾化议题, 出台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 力图完成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夙愿。

在安倍看来, 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安倍立志要制定一部“新宪法”, 完成自民党尚未完成的“立党”使命。在对外关系及对华政策方面, 安倍强调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支柱是“强化日美同盟”, 并表现出对华的强硬态度。自民党2012年众院选举的竞选纲领特别提出: “将强化对钓鱼岛

① 「参院選投票にあたり、9党が声明」、<http://www.yomiuri.co.jp/election/sangiin/2013/news2/20130720-OYTIT01098.htm>。

② <http://www.ribenxinwen.com/html/c/201307/22-17334.html>。

的实际控制和稳定管理，调整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的政策，并将讨论在该岛上常驻公务人员，改善周边渔业环境等。”在安全保障领域，该纲领提出要制定出台《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案》，使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提升为“国防军”，扩充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人员预算，制定有关领海警备的相关法律。

第 23 届参议院胜选后，安倍内阁拟就调整所谓安全政策等议题展开讨论。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表示，为了使该党的宪法修改草案获得国民的理解，考虑在全国各地召开对话集会。石破茂还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宪之前，政府应当先在年末策划出《防卫计划大纲》修改方案，再去磋商集体自卫权及修宪等事宜。但是，自民党政要多言不由衷，不论是放言国民讨论修宪，还是先行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其实均是为修宪制造舆论氛围而已。

“和平之党”公明党作为自民党的联合执政伙伴，对于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及政策，保持一定的制约力。公明党作为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比起革新政党与保守政党来说，不仅可以采取“中道主义”政策的灵活性，而且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游离于保守与革新政党之间，在拓展了其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取得在日本政党格局中相应的位置。“1955 年体制”崩溃后，公明党变通政治策略，取得与保守政党联合执政地位，但公明党声称仍然坚持自身的立党原则和理念。第 23 届参议院胜选后，公明党表明对自民党的“修宪”计划有不同观点，但希望继续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因此，其对自民党的约束力有限。

（二）参议院选举后在野党谋求重组，显露认同政治右倾化意向

日本参议院大选后，民主党、日本维新会以及大家党等各党派进入总结及内部整合阶段。日本维新会党首桥下彻表明在野党势力重组的想法：“若在野党不面向下届众院选举对话，拧成一股劲，就无法对国家做出贡献。”^① 大家党党首渡边喜美则就争取多党联合执政表示：“即便是欧洲，两党制也并非主流，多党制才更为普遍。应放弃建立新党的重

^①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7/56505.html>.

组念头，现在已经到了考虑通过政党联合进行重组的时期。”^① 在参议院选举中落败的各在野党，纷纷向自己的选举执行机构问责，重组、改编等声音纷繁杂乱，其中也不乏政治右倾化言论。

1. 民主党因败选内讧不断，失去对执政党保守主义路线的牵制力

民主党在第 23 届参院选举中遭遇建党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民主党参加改选的 44 个议席，最终只获得 17 个，创下建党以来最低纪录。可以说，民主党参院败选不仅削弱了自身力量，也宣告日本保守“两党制”构想及实践的终结。

参院败选后，民主党干事长细野豪志宣称就参院选举失败而引咎辞职，并向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提交辞呈。对此，海江田万里等人为维持现行领导体制而极力挽留。日本媒体预测，细野的辞职或将对民主党重振之路造成重创。另外，由于前首相菅直人在参议院大选中支持了已被剥夺民主党候选人资格的无党派人士，导致民主党候选人在东京都选区的竞选失败，违反了民主党党规，日本民主党举行众参两院议员总会，解除菅直人的民主党“最高顾问”的职务，并停止党员资格三个月。^② 同时，民主党发表声明，抗议民主党前领导人鸠山由纪夫在钓鱼岛问题上多次发表与民主党及日本政府立场相违背的言论，影响了民主党在此次参议院大选中的支持率。由于鸠山已脱离民主党党籍，民主党考虑追溯到退党前给予严厉处分。除了处分菅直人、鸠山由纪夫等元老外，民主党党内也有政治右倾化的声音。有人认为：“应该将护宪派议员清除出去，并向拥护修改宪法的日本维新会、大家党等这些党派靠拢。”^③ 在“8·15”日本战败投降日，跨党派议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中，就不乏民主党的参院干事长羽田雄一郎等民主党政要的身影。民主党参院败选后大有认同政治右倾化的意向。

2. 右翼政党崛起，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

日本宪法第 96 条规定提出，实施修宪全民公决的议案必须在众参两院均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参院共有 242 个席位，三分之二即为

①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8/58239.html>.

② 「民主、菅氏の処分先送り 常任幹事会で協議」、<http://www.asahi.com/senkyo/senkyo2013/news/TKY201307240343.html>。

③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66609>.

162 席。众院中，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大家党三个修宪势力共占 366 个席位，大大超过了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320 席）议席。第 23 届参院选举结果表明，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大家党赢得的议席（包括非改选议席在内）未达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但日本“修宪势力”距提案门槛仅差八个议席。

修宪党派日本维新会原计划在参院选举中拿下十个以上席位，但受党首桥下彻关于随军慰安妇发言的影响，最终没有能够实现既定目标，仅获八个议席。尽管该党内部出现对桥下彻不满的声音，但该党召开的国会议员团正副干事长会议，就要求桥下彻、石原慎太郎两位共同党首留任达成了共识。^① 这说明，日本右翼政党并不会在历史问题、修宪及钓鱼岛问题上止步。

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创立之初，该党党徽上面的日本地图赫然包括中国的钓鱼岛。该党发起者桥下彻不仅主张要将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还在第一时间支持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划，并扬言日本应该在钓鱼岛长期派驻警察。石原慎太郎声称日中关系恶化“责任在中国”，主张应在钓鱼岛上建设灯塔和船只避难所。在日本维新会 2012 年众院选举的竞选纲领中，针对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活动，主张日本要加强海上防卫能力、重新制定自卫队的武器使用标准、废除实际国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 以下的规定。关于钓鱼岛问题，主张应加强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敦促中国诉诸国际法院仲裁”，并提出尽快制定《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以便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该纲领明显表明其对华强硬姿态，与自民党的保守主义理念有不少相同之处。

尽管日本维新会还不具有执政的条件，但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以右翼形象示人，强化了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在参议院选举后，日本维新会推动保守各党在执政理念及内外政策上趋同，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日本政坛进入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期。

（三）传统革新政党对于政治右倾化的疑虑

日本国会选举采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以来，社民党、共产党等

^① 「維新、橋下共同代表の統投決定 辞意表明に石原氏ら慰留」、<http://www.asahi.com/senkyo/senkyo2013/news/TKY201307270096.html>。

其他在野小党候选人的当选几率普遍下降，已无力有效牵制执政党自民党出台有关保守主义的政策和法案。面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在野的传统革新政党表现出对于日本政党政治格局变动及政局走向的忧虑。第23届参院选举中，社民党、绿色之风、生活党等小党所获议席不是个位数就是全军覆没，完全失去了对于执政党的牵制力，仅有日本共产党近12年来首次获得参院选举区议席，共获八个席位，创该党自2001年采用现行比例代表投票方式后的最高纪录。该党于参院选举中提出“与自民党的‘自共对决’是真正的对决轴心”，抨击赞成修宪的日本维新会及大家党是“安倍政府的补充势力”，并希望和日本民众及其他在野党以阻止修改宪法、反对消费税增税及摆脱核电为中心，携手共同抗争。

第23届参院选举后，日本共同社于2013年7月23日汇总出以参院选举当选议员和非改选参议员共196人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有142人认为“应修改”宪法，占72.4%。但是，对于修改宪法第96条以放宽修宪提案条件的做法，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不相上下。同时，在共同社对参院选举当选者的问卷调查中，各政党就是否应先行修改放宽修宪提案条件的宪法第96条意见不一。自民党的大部分当选者同意先行修改，但公明党的所有当选者均表示反对。在野党方面，日本维新会的当选者全数赞成先行修改，大家党大多数表示赞成，民主党大部分表示反对。对改变宪法持反对立场的日本共产党及社民党全数反对先行修改。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共同社舆论调查显示，第23届参院选举后，安倍内阁支持率为56.2%，比6月调查时的68.0%大减11.8个百分点，同时不支持率达到了31.7%，较上次调查的16.3%上升了近一倍。尤其是“没有特定的支持对象”人群中支持安倍内阁者所占比例为29.2%，比上次调查时的48.0%大幅下降。^①这表明，日本民众感受不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惠民效果，尤其是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前谈及要修改宪法第九条，胜选后又表示将就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展开讨论等政治右倾化的言论，导致内阁支持率下行的可能。一些日本选民对于安倍“修宪”产生疑虑，担心日本战后以来的和平主义失去宪政依托。同时，安倍内阁计划修改民主党执政时确立的《防卫计划大纲》、渲染

^①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7/56547.html>.

“中国威胁论”等言行，让传统革新政党及有些民众担忧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未知后果。然而，传统革新政党及和平主义势力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不足以形成遏制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有生力量。

四 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的正相关性

通过前面关于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右倾化与总体保守化的相关性、日本政坛“一党独大”回归及政治右倾化趋向等三个方面的阐述，可以认为，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是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内在关联性的、先后继起的同向性关系。二者明显存在着“一个变量会随着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内在相关性。从日本政党政治及政治过程来看，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相关性关系表现为，随着“万年执政党”自民党的保守主义理念内化于日本的内政外交，日本政治正在不断走向右倾化。

从政党政治的历史来看，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往往“每个政党都在根据现实因素的格局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纲领，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每个理智因素都可能改变”。在冷战结束带来的剧烈社会变动时期，日本政党调整政策、改变纲领极为普遍，不仅是社会党、共产党，甚至连带有宗教色彩的公明党也积极调整政策谋求执政。但是，只有自民党任凭多次分化组合，其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组织架构未变，“只要一个党的理智世界在历史运动的、历史延续性的交叉点上仍具有一贯的组织，它就仍然是一个我们正在谈论的总体”^①。这也就是本文所分析和求证的日本总体保守化。卡尔·曼海姆所指的这种“总体”，具有很强的理念及组织整合机能，是一种“动态结构综合体”，就如同日本自民党所主导的总体保守化。它通过不断调整策略，强化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使有些在野党放弃原有纲领，逐渐倾向于自民党。日本政党政治的这种总体保守化，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日本政界分化组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嬗变的结果，而且

^①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 64 页。

是日本政治改革、社会变迁的产物，并且导致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加剧。

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有着直接相关性。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点明了总体保守化与日本政治倾向的直接相关性。“我所说的自自联合或者说自自合流，而这是史无前例的。还有把公明党也包括进来的政党联合，这在制定政策与形成政治力量方面也是没有先例的。”^① 中曾根所说的“自自合流”，就是自民党“裂变”后再“聚合”的总体保守化扩张，将公明党纳入联合政权，在壮大政治力量的同时，使得自民党出台保守主义政策更具合理性、隐蔽性。这也是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直接原因。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种种迹象，是日本保守政党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具体表现，而保守主义作为保守政党的政治信念，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和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日本的保守主义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并没有改变其性质。在日本盛行的保守主义氛围中，政党格局的总体保守化，必然导致日本的政治右倾化。通过对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化及其特点的历史与现实分析，可以得出日本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有着直接相关性的判断和认知。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总体保守化的必然结果。有的学者以“日本的‘右倾’与保守化问题”为题，就日本日益突出的“右倾化”政治现象指出，“所谓‘左’、‘右’，是一种相对概念，没有‘左’就没有‘右’，日本的右派，当然是针对左派而言的。”“保守也就是针对革新而言的。”^② 这样就可以通过“左”和“右”的相对性，引出日本革新党与保守党的对立以及此消彼长的政治格局，说明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是保守政党通过执政而实施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政策的政治现象。但是，有的学者则认为，政治右倾化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③ 还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纵容右倾势力抬头、强化

① 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129頁。

② 邓红：《谈谈日本的“右倾”与保守化问题》，《中国评论》2000年6月号。

③ 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日美同盟体制等表现。^① 这样的概述性解释,是基于对日本总体保守化背景下保守主义理念及政策的概括,比较直观地概述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对于政治右倾化与总体保守化的相关性问题的,日本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曾指出:“切身感受到整个政界都在右倾。在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的时代,双方势均力敌,政治基本是中庸的。如今那样的平衡已完全被打破。”他认为,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的议论之声高涨,强调爱国心的主张越来越强烈,这都是右倾化的表现。^② 这样的观点点明了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性,进一步指出总体保守化是政治右倾化产生的本质根源。上述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明确了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右倾化与总体保守化的相关性及自民党“一党独大”导致政治右倾化的日本政治状况,廓清了日本政党格局及政局走向。可以说,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必然导致政治右倾化的加剧。总体保守化不仅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因变量,而且也为当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回归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般来讲,政治上的“右倾化”,主要是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表现出来的,而这恰恰是执政的自民党保守主义政治理念转变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的具体体现。在日本的总体保守化进程中,执政的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逐渐脱离战后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重经济,轻军备”的传统路线,使日本朝着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安倍晋三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崛起。他们主张对内进行政治改革,力求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外倡导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推行“正常国家”战略构想。在政治右倾化的形势下,日本保守势力已经将一些言论变成实际行动,利用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案、周边事态法和“有事立法”相关三法案等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法案。随着奉行保守主义的自民党再次执政,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深化,主要表现为: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力图实行集体自卫权并修改和平宪法,以“中国威胁论”为借

① 参见刘长敏:《试析当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年第6期。

② <http://china.kyodo.co.jp/2004/sekai/20040429-204.html>.

口扩充军备、极力提升军事实力，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等等。取代民主党重新上台执政的自民党将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及修改和平宪法提速，安倍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改变战后体制的意愿十分明确。这引起了亚洲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担忧。为此，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就安倍政府拟加强防卫力量并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寻求理解，称“目的在于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他解释说：“虽然有意见指出这是右倾化，但这完全是误解。”^①然而，自民党赢得第23届参院选举之后，麻生太郎就释放出日本修宪要仿效纳粹德国修改《魏玛宪法》的做派的右倾化言论，更是让全世界震惊。这些政治右倾化的表现，已经引起了亚洲各国及世界舆论的高度警觉。

综上所述，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有着正相关性。正如日本学者安井裕司所言：“自民党在第46届众议院总选举时就表示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和自卫队改国防军。当自民党获294个席位，加上改宪派日本维新会的议席比率超过三分之二，使得随后参议院选举中继续改宪程序议题成为可能，因此所谓‘右倾化’的说法是没有错吧。”^②事实证明，通过第23届参院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赢得135个议席，在参议院超过半数，终结了长达数年的“扭曲国会”的困局，自民党在国会重新确立“一党独大”的优势。加之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大家党和新党改革等修宪势力的空前壮大，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全面加速。可以说，随着日本总体保守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两者是一个正相关的发展过程。

（责任编辑：李璇夏）

①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6/53295.html>.

② 「日本の政治は『右傾化』しているのか？『保守化』しているのか？それとも『ナショナリズム』なのか？」、<http://www.quon.asia/yomimono/business/global/2012/12/22/3762.php>。

論文要約

総保守化及び政治右傾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第23回参議院選挙後の日本の政局論を兼ねて—

呂 耀東

日本の政党政治の歴史と現実、日本の総保守化と政治右傾化が直接関連し向かい合って進行してきていることを十分に証明している。日本の伝統革新政党及び他の野党勢力は次第に弱まり、日本の政党の総保守化及び政治右傾化の抑制力として十分に機能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第46回国会衆議院と第23回参議院選挙における伝統保守政党の自民党の二連覇によって「ねじれ国会」が一举に打破されたことは、自民党の単独政権への復帰と「両党制」構想及び実践の終結を宣告し、日本の総保守化の加速と政治右傾化の激化をもたらした。

日本の改憲プロセスの加速化原因の解析

李 文 具 限

日本の改憲プロセスは、経済状況・政党政治構造および政治文化という三要素からの制約と影響を深く受けている。経済の長期的な低迷が政府に対する国民の不信任と政治不安定を深刻化させたため、保守勢力は地位が急上昇され、改憲によって「普通国家化」の障害を一掃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れは日本の改憲プロセスを加速させた誘発原因である。政党政治に構造的な変化が起こり、護憲派の勢力が次第に衰え、日本政治が総保守化に傾いていることは、日本の改憲プロセスを加速させた直接な原因である。日本の政治文化に自由・平等の遺伝子が乏しく、日本社会において正義の力が主導的な地位を占めることが難し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は、日本の改憲プロセスを加速させた根本的な原因である。以上の三つの要因の相互作用と相互影響により、改憲と軍備拡充が広く国民的な共通認識を醸成しやすい政治主張となっている。

戦略文化から見る日韓安全保障協力の要素構成

巴 殿君 王 勝男

対外政策の策定と実施はその国の戦略文化に左右される。戦略文化は、戦略